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特色文化研究

浙东文化 与秦晋文化比较研究

南志刚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特色文化研究 TS29.201705

浙东文化 与秦晋文化比较研究

南志刚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文化与秦晋文化比较研究 / 南志刚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308-16179-4

I. ①浙… II. ①南… III. ①地方文化—比较文化—
浙东、陕西省、山西省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1195 号

浙东文化与秦晋文化比较研究

南志刚 等著

责任编辑 张小苹
责任校对 李增基 董 唯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179-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前言：从中华文化建构观照浙东文化与秦晋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各区域文化，在长期历史流变过程中，经过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既具有整体风格，又具有多元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中，浙东文化和秦晋文化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建设作用：一方面，它们都不断吸纳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文化因子，作为自身文化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与异域文化的整合，借鉴“外来”文化的精神资源。中华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大传统的文化，秦晋文化内容融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对中华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浙东文化作为具有“异质”特色的文化，总是在中华文化遇到相对困境的时候，以“小传统”力量，促使中华文化吸纳新鲜血液，走向文化新生。近代以降，浙江领风气之先，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秦晋文化难以企及的活力，浙东文化的代表人物放眼看世界，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结合现代中国的国情民情，敢于“拿来”，勇于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

秦晋文化是内陆性黄土文化代表，浙东文化则是开放性海洋文化代表。黄土文化安土重迁，老成持重，更多体现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海洋文化开放漂泊，充满活力，更多体现文化结构的创新性。一个稳定性，一个创新性，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稳定，保障了中华文化虽历经劫难，仍留存文化本色，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创新，克服了中华文化的因循保守，激活了中华文化的内在潜力。秦晋文化和浙东文化虽作用不同，却都为中华文化历史的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立足于中华文化建构的整体进程,坚持文化价值平等理念,从文化多元共生互融的视角,撷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浙东文化的若干典型性内容,在彰显各自文化内涵与文化个性的同时,注重三地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共通互融,分析三地文化在中华文化建构中的各自作用与文化合力作用。为此,本书采用三种相应研究方法:其一,比较文化学方法,平等对待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浙东文化,尊重区域文化个性,深入分析文化事项背后隐含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发掘区域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其二,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即要求从中华文化历史建构和文化价值追求的整体性上把握三地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对三地文化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勾勒区域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文化选择和文化走向,以归纳其“异质”互补性。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既对文化形成的基础、历史文化、学术文化等进行比较研究,也对民俗文化、商业文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等进行比较,将基础理论思考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本书分为六章。

第一章,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旨在对浙东区域文化和秦晋区域文化形成基础进行比较分析。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等多种区域文化,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历史长河。本章首先以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为基本依据,分析陕西、山西等黄河中游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其次以东南沿海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为基本依据,分析浙东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最后选取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为典型案例,对比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性。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均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选择多水之地作为生存场域,发明了以陶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也显露出种植农业生产的萌芽,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也存在着生产工具结构差异、主要农作物品种差异(稻和稷)、居住房屋材料和结构差异等,表现了中华先民在各自生存环境下的不同文化选择。

第二章,秦晋与浙东历史文化比较。结合中国历史进程,比较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浙东文化形成与兴起的历史时段、文化类型、文化内涵、文化特征等方面,揭示三地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贡献。秦文化和晋文化属于典型的黄土地内陆文明,浙东文化更多体现出中国式海洋文明的特点。周秦文化奠定了三秦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汉唐盛世促进三秦文化达到鼎盛时期,从南宋开始的文化中心转移,三秦文化进入“斜阳”时期,由文化主流走向文化边缘。三晋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北魏时期,晋及三家

分晋形成的文化和北魏文化是三晋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京师护卫”和多民族文化融合是三晋文化的重要特征。浙东文化的源头是于越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五代时期的吴越国是浙东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宋室南渡至元明清阶段,浙东文化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文化特色日益彰显,明清两代浙东文化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对中国文化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浙东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共同汇聚到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中,在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引领下,不断地支撑着、引领着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三章,关学与浙东学术,旨在比较分析三地学术文化。在分别描述关学和浙东学术历史发展脉络基础上,提炼关学与浙东学术的共同特征与学术精神。两地学术文化共同特征表现在:源远流长、代有传人;博采众长,有容乃大;书院体制,培育人才。学术精神互通之处表现在:究天人之际的科学创新精神,躬亲礼教的伦理实践精神,刚正不屈的士人品格和爱国精神。

第四章,秦商、晋商与宁波帮。旨在比较分析三地商业文化及其精神内涵,在勾勒秦商、晋商和宁波帮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提炼三大商帮在经营品类、商业范围、突出贡献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特征,彰显三大商帮在中国商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各自作用与合力作用。特别分析了宁波帮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深层原因,指出宁波帮的三个“现代化”:商人身份现代化、经营产业现代化和文化精神现代化。

第五章,黄土地民俗与海洋民俗,旨在进入中华文化深层结构,从民间文化形态角度分析秦、晋文化与浙东文化的不同特征。采用宏观扫描和典型民俗事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民间艺术、生产活动等方面形成的习惯、理念着眼,以期显现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状态。

第六章,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旨在分析三地对待历史文化资源的态度和开发经验。首先,进行三地旅游产业现状的比较分析。其次,选取三地代表性旅游景区开发实例,如兵马俑与法门寺,乔家大院与五台山,天一阁与普陀山等,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的不同策略,总结先进经验,以期相互借鉴,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目 录

第一章 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	(1)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成	(1)
第二节 三地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	(3)
第三节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比较研究	(4)
第二章 秦晋与浙东历史文化比较	(17)
第一节 三地文化的形成与兴起	(18)
第二节 “各领风骚”的历史文化	(33)
第三节 区域文化视域下的三地文化比较	(45)
第三章 关学与浙东学术	(52)
第一节 以气为本与以礼为教的关学	(53)
第二节 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	(63)
第三节 浙东学术与关学的共通之处	(74)
第四章 秦商、晋商与宁波帮	(82)
第一节 秦商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精神	(82)
第二节 晋商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精神	(104)
第三节 中国商帮的近代转型——宁波帮	(123)
第五章 黄土地民俗与海洋民俗	(143)
第一节 区域地理与民俗文化圈	(144)
第二节 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153)

第三节 婚俗、亲情文化和生活禁忌	(160)
第四节 各呈异彩的民间艺术	(168)
附:亲情·祈福·生命——华州面花艺术的社会功能分析	(173)
第六章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	(182)
第一节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个案分析	(182)
第二节 宗教文化与自然资源利用个案分析	(197)
第三节 秦晋与浙东旅游现状分析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23)
关键词索引	(229)
后 记	(232)

第一章 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

远古文化即远古时代的文化,是从人作为新的物种出现起至国家出现前,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人类文明的肇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步基石。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成

在远古时代,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尽管他们找到了一条与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以自己的生存意志为导向改造自然界,而不是一味接受自然界为自己安排的结果,但觉醒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人类的知识和力量都十分有限,依然受到自然界相当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他们生存繁衍区域而不是其他更加遥远的地方,它自始至终影响着远古时代人类的活动,并被忠实地反映在了各地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不同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这些环境因素正是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景象的一大根源。

由于远古时代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当国家产生,人类文明的基石趋于牢固之后,人类在回首自己前进历史时就发现了它的作用。在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文明决定于气候,柏拉图则发现人类的精神活动往往与海洋同步,相对于他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则更加体系化,他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性乃是受到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种种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十分可惜的是亚氏并没有将这一伟大发现充分

完善,而是将其绝对化后应用于政治,认为处于寒冷与炎热之间的希腊人具有统治其他民族的天责,这一谬误对后人的影响与亚里士多德的发现同样深远,逐步发展成“地理环境决定论”。18世纪时,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具体到生理结构、心理特征、气质性格、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各个具体方面,同样掉入了绝对化的陷阱,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①,热带诞生专制而温带适宜自由,以此作为反对欧洲君主专制的政治武器。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首先将地理环境决定论带入地理学研究,并得到现代地理学奠基人赫特纳和“板块学说之父”魏格纳等著名地理学家的支持,在学术界风噪一时。但其理论的硬伤并没有消除,在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关社会起源和发展的片面观点遭到后世学者的不断批判后,人们开始将其连同这一理论的部分合理性一起忘却了。

人类在不断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已处于和自然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的恶果超乎了人类自身的预估。无论是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海平面上升,还是因为石油泄漏或塑料等高分子材料生活用品遗弃而产生的各种污染,都在严重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命运,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自然家园的关系。在这一局面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而不仅仅是作为陈旧哲学的一部分过时理论来看待了。远古时代是我们与自然界关系最为密切、和谐的时代,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虽然不能决定后世各文明千百年的发展优劣,却也对它们的走势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些作用正是自然力量的体现,无视这些作用只会使人类重新堕入盲目自信的深渊,从这一角度看,开展远古时代各文化间形成基础的比较研究,了解远古文化间异同与自然环境差异之间的关系,其意义就远远超出单纯的回望。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自远古时代起,这片土地上就到处涌现出灿烂文化,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广袤国土的每个角落,气候类型和自然环境也多不同。正是因为同时拥有远古文化的丰富性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两个条件,中国成为开展远古文化形成基础研究的最佳对象。在中华大地孕育的众多远古文明中,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河文明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江文明无疑是最为繁荣的,

^①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前者的代表为发现于陕西的半坡文化,后者的代表为发现于浙江东部的河姆渡文化。将这两个地区的远古文化形成基础的差异与这两个远古文化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分别作比较研究,从而发现这些区别产生的某些规律,是此项研究开展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目的。

第二节 三地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

陕西、山西地区位于中国中部的内陆地区,离海岸线较远,受到东部季风的影响较小。在地理上,这里属于黄土高原的中部和东部,具有鲜明的地理特性。

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关于它的成因,地理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风成说”——来自西部干旱地区的内陆风将细小的尘埃和沙粒带到这里,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宽广厚实的黄土塬地,这些塬地被黄河及其众多的支流水系所编织的湍急水网切割成无数座长条状的山梁和馒头状独立的山峁,成为今天支离破碎、沟壑纵深的模样。

从气候类型上看,黄土高原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差异极端而明显。冬季直接暴露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大干冷气团的影响之下,气候寒冷干燥,常有大风沙,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印度洋低压的影响,气候炎热,多暴雨。年降水量由西北向东南递增,按照 400mm 等值线为界可划分为西北部干旱区、中部半干旱区和东南部半湿润区,而远古文明发祥地陕西、山西地区主要位于中部半干旱区和东南部半湿润区,是黄土高原降水量比较丰富的区域,但仍然不能和我国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相比。另一方面,黄土中氮、磷等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元素成分含量较低,使得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率较低,森林主要分布在梁峁间的河谷地带,而梁峁坡面和塬地上分布的主要是草原。由于植被覆盖率本来不高,加之黄土还存在着孔隙大、结构松散的问题,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现象极为严重,生态系统很容易被破坏。从人类生存繁衍的角度看,这里的自然环境客观上较我国东部和南部的平原地区稍逊一些。

尽管对于人类来说,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并不是最为优秀的,但这并不能妨碍它成为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早在 110 万年前,黄土高原迎来了它最早的人类居民——蓝田人。此后,这块土地上的人类活动并没有因为自然环境的逐渐恶化而停滞,陕西大荔人和山西丁村人的发现,都

雄辩地证明了人类自出现开始就成功地深深扎根于这块土地之中,这是半坡文化,也是后世黄河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浙东远古文化发源于宁绍平原,位于浙江省最东部,北接杭州湾与长江下游平原,东临浩瀚的海洋,西部和南部为丘陵包围。从气候类型上看,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虽然也受寒冷大陆气团影响,但远没有西北地区大,相对而言温和许多,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普遍炎热高温。除此之外,由于地处大陆气团影响的最前沿,同时又是热带海洋气团影响大陆的首冲,因此,这里气旋活动频繁。降水量较为丰沛,年降水量平均达到1000mm左右,且主要集中在春夏之际。受到长江水系的影响,加上丰富的降水量,这里逐渐形成了河湖密布的湿地平原特征。这里的土壤多是河湖泥沙沉积而成,有机物含量较丰富,加之气候温和、降水充足,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因此植被覆盖率很高,尤其是在远古文化的发源时代,气候相对于现在更加温暖湿润,甚至类似于今天广东、广西地区,包括象、犀等热带动物在内的各类动物都活动于这一区域,这也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良的条件。^①

浙东地区属于长江下游流域,而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早在200万年前,著名的巫山人已经生活在这片水域中游附近了。尽管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人类活动要比中游地区晚很多,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却是文明诞生的温床。考古资料表明,早在5万年前,浙江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远古先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断繁衍生息,最终使这里成为了长江文明的发源地,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第三节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有着许多相同的特征。首先,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经碳14测定及年轮校正后,河姆渡文化的发源时代大致在距今约7000年前,略早于半坡文化的6000多年,二者基本上还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女性是这一时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她们不仅在生产中占据主要位置,还是家庭、部落组成的基础,婚姻、丧葬等社会活动也都围绕妇女展开,这是这一时

^①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期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所处的时代接近,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生产生活条件也基本相同。人们以氏族形式聚居,构成一个个部落,氏族或部落的领袖都由女性担任。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半坡文化的先民都已经学会建造房屋,开始在自然环境中营造固定的生存空间。在生产工具方面,金属工具还没有被发明,人们采用能够天然直接获取的材料制作工具,但一种新的生产生活用具——陶器已经被发明,其技术也被迅速推向成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都发源于大江大河的流域覆盖地区,水资源充足,自然条件相对于远离水源的其他地区优越。因此,在这种特定环境滋养下,二者也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受江河眷顾的文明发祥地一样,成为农耕文明兴起的摇篮。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半坡文化,都发明了种植技术,产生了原始农业的萌芽。尽管渔猎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这些萌芽的作用不可小视,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经济的走向,也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尽管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但二者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也显而易见。这种差异,多数可以追溯到二者发源地的自然环境差异上,是远古文化形成基础比较研究开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生产工具的结构差异

尽管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先民使用的工具都是以天然材料加工的工具为主,但二者在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看,河姆渡先民的生产工具有骨器(包括牙制和角制器物)、木器、石器、陶器等,其中骨器居主要地位,木器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①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水平很高,除了前代文化已有的骨针、骨簪、鱼钩等小件器物外,还能加工一些相对大型的器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用于耕作的骨耜和用于纺织的骨匕。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作用如同现代的铲,多由一整块有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骨耜上不仅有用于系绑绳索的穿孔,还留有安装木柄的銎和装柄浅槽,使工具在使用时更加牢固耐用,是河姆渡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骨匕是一种纺织工具,因其形似匕首而得名,一端长而宽扁,类似匕首刀刃部分,另一端为一个细小的把手,类似匕首的柄。这类骨匕也多是

^① 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整根大型动物的肋骨制成,通体打磨光滑,在制作难度上更高于骨耜,许多器物身上还雕刻有细密阴刻线构成的纹饰,以各类凤鸟图腾最为典型,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木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也较多,且种类十分丰富,有矛、匕、铲、纺轮、槌、器柄、桨、矢、碗、桶、棍、齿状器、经轴等,加工工艺同样高超。矛的前端有经过火烧硬化的处理痕迹,攻击性和耐用性都有提高。木碗上发现了髹漆的痕迹,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漆器文物。^①当然,最能反映当时木器加工技术的还是一些大型木器,这其中除了有带有复杂精密榫卯的各种建筑构件,还有六支木桨。^②有桨必定有船,尽管河姆渡遗址并没有发现完整的独木舟遗存,但考古人员还是在遗址中发现一块中心挖空,一端收敛略尖,一端残损,横截面为弧形的巨大残存木器,被当做作板使用,应该是当时一条废弃的独木舟。^③另外,在新近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余姚田螺山遗址还出土了保存较为完整的独木桥和木构寨墙。^④在当时的条件下,制作这样巨大的木器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而河姆渡人用简单的工具完成了这些奇迹般的作品,不能不令人惊叹。

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相比,半坡文化先民的主要生产工具为石器,且加工较为粗糙,缺乏整齐的棱角,加工部位多在器物的刃部,通体打磨器很少。骨器多为小件的骨镞、骨针、鱼钩等,没有大型器物,也没有木器发现的记录。^⑤客观地说,半坡文化尽管稍晚于河姆渡文化,在决定生产力大小的一项重要环节——生产工具的制造上,似乎要稍落后于河姆渡文化。这一现象恐怕和二者发源地环境脱不了关系,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宁绍平原,无论是植被覆盖率还是物种丰富程度都远远高于黄土高原,优越的自然环境在为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带来丰富的生存资源之外,也提供了丰富的工具材料,这也正是骨、木等可以直接由生物体获得,加工也较方便的原料成为河姆渡人生产工具的重要原因。而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半坡人,获取这些原材料的机会相对小得多,尤其是木材,对于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地区来说,

①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② 陈忠来:《河姆渡文化探源》,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③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④ 田螺山遗址编委会:《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新视窗》,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⑤ 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几乎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采伐的,因此在半坡文化中没有发现这些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主要经济作物不同

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都产生了原始种植业,但二者的主要经济作物完全不同。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河姆渡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水稻是当时河姆渡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河姆渡文化年代最早的第四层中,发现有大量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最厚处甚至超过一米。根据同时出土的水生植物孢粉,以及出土骨骼所属动物的生活习性来看,河姆渡文化先民生存的区域很可能有大片的沼泽分布,且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足,这一环境为水稻的栽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这里成为稻作文化发祥地的自然基础。

半坡文化的先民们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粟,或称稷,也就是小米。考古人员曾在半坡遗址中多次发现罐装和窖藏的粟,这种作物不同于水稻,对水和土壤的要求不高,是优秀的耐干旱、耐贫瘠作物,非常适合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先民们种植。此后,粟作为黄河流域耕作文化的代表随着黄河文明的壮大而深入人心,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还登堂入室进入了祭祀活动,成为不可或缺的供奉品,并作为农业的象征成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

3. 房屋建筑主要形式不同

考古资料显示,半坡文化先民的房屋建筑形式主要有圆形半地穴式、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方形地面式和方形地面连间式。^①其中方形地面连间式的房屋在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得极少,而总体上看,地面式房屋又远远少于半地穴式房屋,圆形、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是半坡文化的主要建筑类型,其中圆形半地穴式一般面积较小,方形半地穴式一般面积较大。这种建筑的特点是房基凹入地下,坑壁基本上就是房屋的墙壁,房屋内设有灶坑,但基本没有隔间,只在入口的两侧设有两道隔墙,房屋内的居住面经各种材料涂抹后烘烤坚实,房屋内外都埋立柱,用于支撑顶棚。这种建筑高出地面的部分很少,还带有浓重的穴居风俗遗留,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气息。圆形、方形地面式建筑的格局基本同于半地穴式建筑,区别是地基不下凹,平地起墙,墙体由草拌泥的红烧土或石灰质物质构成,立柱嵌于墙中支撑屋顶。这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种建筑相对于半地穴式建筑更加接近现代建筑,是建筑工艺进步的表现。

不同于半坡文化的先民,河姆渡文化的先民采用相对复杂得多的榫卯式结构建造房屋,创造了作为中国木结构建筑鼻祖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完全由木材拼接,材料之间有精巧的榫卯用于加固,其外形上最大的特点是居住面高于地平面,建造于数排桩木之上,居住面以下腾空,甚至可以部分半立于水中,与后世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吊脚楼在基本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分别,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半坡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房屋的建筑方式不同,主要取决于黄土高原与宁绍平原不同的自然环境。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相对较低,而黄土本身又有极易采取的特性,因此半坡文化的先民在建筑房屋时自然多采用土工的形式。当然,黄土质地疏松,不能直接作为建筑材料,必须经过火烧,拌入草枝或石灰等材料加固后才有稳定性^①,因此相对于直接挖掘房体来说,在平面上垒砌地面建筑的难度无疑要大得多。直到现在,生活于黄土高原的人们还在黄土层中直接开掘窑洞,这也正是半坡文化中半地穴式建筑仍然占据建筑形式的主流,没有完全让步于地面式建筑的重要原因。

7000年前的宁绍平原温暖多雨,降水丰富,尤其是每年夏秋之际多暴雨暴风等强对流天气。森林覆盖率高,使得人们被迫与各类毒虫猛兽同居,受各种湿热瘴毒的侵扰。在这些不利因素面前,河姆渡人就地取材,发明了干栏式木构建筑以增强安全性。相对于原始的土工建筑,有着榫卯穿插的木结构体系在坚固度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抵御雨水的长期侵蚀和各种强对流天气的侵害,凌空而起的干栏式结构又将人们与来自于森林的湿热瘴毒、毒虫猛兽相隔开来,避免了河湖泛滥的侵害,提高了居住的安全性^②,而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也在与当年宁绍平原自然条件相近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筑中保留。

4. 陶器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不同

对于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的先民们来说,陶器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但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这两个文化的制陶工艺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主要表现在陶器的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两个方面。

首先看陶器的制作工艺。一般认为,半坡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已基本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② 陈忠来:《河姆渡文化探源》,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超越陶器制作发明的初期阶段。其胎土用料都来源于当地,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较为细腻,烧成后胎体呈现砖红色,称为泥质红陶;另一种陶器胎色相近,但胎质稍粗,胎土中夹杂着细小的沙砾,称为夹砂红陶,烧成温度约为 950—1050 摄氏度。所有陶器皆为纯手制,小件器物直接捏塑成型,大件器物则采用泥条盘筑法,即使用长泥条盘旋堆砌成基本型,再用手工修整牢固的技术。特大件器物则采用泥圈叠加法,即先用多个大泥圈砌出基本型,再手工修整牢固的技术。小件器物一般胎质较细,而胎质较粗的夹砂红陶多为大件或特大件的炊具和容器。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夹砂红陶是半坡陶器中较为粗陋的品种,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夹砂红陶的胎质并非是由于淘洗不够精细而致粗疏,相反其中的沙砾很可能是故意加入的,以此来提高大型器物胎土在受热后的稳定性,提高成品率。如此看来,这反而应该是半坡文化的先民高超制陶工艺的重要体现了。^①

从已发现的实物来看,半坡文化的陶器皆为平底器、尖底器或圜底器,尖足器极少,没有袋足器。^② 器型主要有钵、盆、壶、罐、瓮、豆、灶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尖底瓶,这种瓶是当时的一种汲水器,特征为小口带唇,鼓腹尖底,腹部两侧带系,可穿绳索。这种尖底瓶在造型上符合力学原理,放入水中后即快速下沉,盛满水后会自动立起,方便取用,是远古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相对于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更为原始,从现有的实物来看,贯穿全部四个文化层,出土数量最多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被称为夹炭黑陶的陶器。这种陶器胎质灰黑粗松,因在胎骨中往往存在大量植物屑和料炭化后残留的木炭颗粒而得名,烧成温度大约为 800—850 摄氏度,成品硬度低,吸水性强。所有陶器均为手制,小件器物直接捏塑成型,大件器物也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造型不准确、胎壁厚薄不均、弧度不统一等问题大量存在。尽管有学者认为夹炭黑陶胎体中的炭化植物是河姆渡人有意添加入陶土的,其作用与夹砂红陶中的沙粒一样,可以提高器物在烧制过程中的稳定性^③,但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从出土器物来看,在烧制温度、器型规制度和吸水率的比较上,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黑陶的表现都略逊于半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1 页。

② 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③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4 页。